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董振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原总编辑、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薛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崔唯航分别作了“宽窄辩证法与生活哲学”“宽窄思维和中庸宽容的价值”“宽窄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主题演讲,从各个维度阐述对宽窄哲学现象的观点和看法。本版内容为本报记者据上述人士在2018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有删节。



董振华

宽窄辩证法与生活哲学

就“宽窄”这个哲学命题的提出来讲,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董振华认为,它是立足于四川本地文化的命题,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命题。

对于宽窄辩证法怎么理解呢?董振华从生活的本质展开论述。“生活只有对人对人来讲才叫生活,生活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文化是人的生命实践和生命体验。从罗素到黑格尔都有类似的表达:要想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而了解民族文化,就要了解它的哲学。因为哲学就是民族的智慧,就是民族文化的精髓。”

《周易》里有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集中体现出了这个民族的智慧。“道”和“器”是什么关系呢?道器不离,道由器显,器由道生。道在器中,器以载道。道是器之灵魂和本质,器是行道之资具。这里面就蕴含丰富的宽窄辩证法,董振华认为宽窄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可以从《道德经》里去寻找。“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等,这都是一种宽窄辩证法。

董振华赞同李后强书记的看法,宽窄就是心学,因为没有人的“心”,没有人的思想,就没有宽窄概念。因为宽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存在。那么,这个文化存在,在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中,它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同。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大文明:一个是欧洲文明,第二个是中国文明,第三个是印度文明。他认为,文明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

的灵魂是哲学。这三个文明分别对应三种文化:古希腊文化、中国先秦文化和印度文化,而这三种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那三种哲学:希腊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董振华说,黑格尔用哲学家的特有角度对三种文化、三种哲学背后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智慧和逻辑特质,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表达。他说,西方哲学是纯粹的理性,中国哲学是实用的理性。理性就要承认真和假,但是西方的理性表现为要么真,要么假,非黑即白,这是形式逻辑。而中国的理性表现为有真亦有假,可能真,也可能假,也就是说我们在宽和窄、真和假、黑和白之间并不完全分明,这种逻辑叫辩论逻辑。印度哲学是非理性的,表现就是无节制的想象,印度哲学与逻辑无关。三种逻辑不分优劣、高低,各有优点。

宽与窄二者是不分的,宽本来就是窄,窄本来就是宽,宽窄不是对立,它俩本来就是一体的。天和人不是分开的,天人是合一的。而道和器是不离的,道是宽,器是窄。凡是有形的东西都是有局限性的,而道是无局限性的,但是道和器是不离的。这就进入了中国的智慧,即东方智慧。佛教也有这样的智慧,《心经》里面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就是指着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实际上不离背后的本质。

“有无相生”也是这个意思,“有”是存在,“无”不是没有,有和无是一个相对概念,实际上无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无是用一种无的方式而存在。“这里边有一个概念,黑格尔已经接触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它在《逻辑学》中讲的实有和应有

的关系问题。”

董振华认为,能够通达最高智慧的不是西方哲学,而是东方哲学。到了最高境界是一个什么境界?就是不能说,就是说不出来,只能悟。因为你说出来就是明确规定,一旦行规定就是具体的了,就是有限的了。而最高境界它是无限的,它没法行规定。所以《道德经》第一句话讲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这个意思。而佛家也讲“不可说”也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证据证明马克思直接读了《道德经》,但是我知道《道德经》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不管马克思是有意无意,他肯定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中国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就是天人合一的智慧,将来如果要解决人类面对的一系列危机,最终必须靠中国的智慧。”董振华解释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还用了他们西方的术语来表达了中国天人合一观念。他所设想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斗争的真正和解。

“天人合一,自然就是天,那么人就是人。天人合一实际上是科学和哲学的联姻,也就是工具和价值的合体,而避免工具与价值的分裂。”董振华认为,这里边也充分体现了宽窄思想。《道德经》为人类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指明了一个方向。

薛宝生

宽窄思维和中庸宽容的价值



“对于宽窄、对于哲学,我们要打开脑洞,要注重从其他学科的角度重新解读我们原有的一些理念。”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总编辑、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薛宝生解析说,我们的数字中国、数学中的世界,实际是对应现实世界的一个虚拟世界。从数学的角度,从物理学角度,可以完全解释我们现在的世界,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不够,没有在这方面下很大功夫。特别是从文科学科起步的专家,注意从这些源头解释问题,非常重要。

“我觉得李后强书记讲得好,点成线,线成面,面成球。点、线、面、球之后的概念就是宇宙。宇宙有两个,一个是内心的宇宙,一个是现实的宇宙。宇宙当然是很大的,用这些概念来看待宽和窄的问题,我们发现‘宽窄’有概括不了的东西,有变幻的东西,但是也有很能说明和解释宽窄概念的东西。”薛宝生说,“我们不能要求宽窄概念能够完全解释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但是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发。”

“线由点组成的,点可以代表什么很多。如果再成为面,成为球,这成为所谓整体论的关系,模糊论的关系,已经说不清了。包括我们现在的网络世界,它是非常立体化的多能的一个可以涵盖一切的东西。”从点和线面球等的关系来说,薛宝生坦言,“我们可以由它理解个人和群体等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以及这个时空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环境,薛宝

生提到“度”的概念。

“如果一条线这边代表一个极端,那边代表另一个极端,我认为最高的人生智慧应该在中间。比如政府的治理,偏向一边人群的政策,这边人群就说好,偏向另一边,另一边的人群就说好,我认为这都不是好政策,大家都认可但都不满意的政策,可能是最好的政策。”这就是“度”的把握,薛宝生认为,人生的智慧和政治的智慧恰恰都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度”也是生命哲学和生活哲学的命题,这就联系到要把握好度,也就是把握“中庸”的概念。在政治领域,或者在行政领域也是有意义的。度就是分寸,就是尺度。但是尺度不是死的,尺度是由人来把握的,所以它既有科学的因素,又有艺术的因素。度本身在实施的过程中,既表现为对科学的尊崇,也是艺术素质的展现。按认识事物三境界的说法,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看水。第二步,以艺术的触角,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经过这两个过程之后,实际上一个创新的形态出现,既不是生活的形态,也不是艺术的形态,是生活加艺术的形态。这个形态表现为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同前两个境界都不同。

“我讲到几个概念,一个宽窄,一个度,度里面带出了中庸,中庸对应的是‘极端’。”极端的东西有没有价值?薛宝生认为有价值,不要一提中庸,就消灭极端。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极端的出现,

从整体论的观点来看,没有极端就没有中庸。“你的中庸恰恰是从和极端的比较中间找到方位的,善和恶,好和坏,都是这样来找到本体的。所以我们要接受生活中有坏事有坏人,有不满意。没有不可能的,关键要改变心态,认识负面的东西既是我们社会的风险,也在反面给我们做一个教材,做一个警示。能这样来认识这个社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心态。”

“极端事件不怕,包括有些人会毁家舍业,不管他前面做了什么,实际上我们从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上,除了恨之外,也应该对他抱着一种怜悯的感觉和救赎的意愿,这就同我们一体化来看待社会的观点一致了。”薛宝生认为,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这就是极端的价值和中庸的价值。“在这点上来讲,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也要承认现实。矫枉过正是可以的,但只能是短期的,中规中矩才应该是永远追求的。所以既要有对事实的尊重,也要对价值的尊重,因为价值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

薛宝生在主题演讲中还强调,“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宽容’需要引进。既然好和坏都有它的价值,都是事实的存在,那么我们应该从心态上接受。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全球化的时代,一定要有宽容的存在,不能固执己见,以一己之私利,以一己之管见来看这个时代。你的经验解释不了许多问题,所以宽容非常重要。”

崔唯航

宽窄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



2018宽窄哲学高峰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崔唯航认为,“宽窄哲学可以说是凝聚了巴蜀智慧的精华,这是我的总体认识。”

宽窄两字,在这里是一个元概念。崔唯航说,“哲学家擅长概念思维,但在他们那里,概念与概念具有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的概念叫做元概念,比如说,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公正等等,用通俗的话叫,元概念也叫大概念。大概念是

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大概念相对的是小概念,小概念大致说来,就是关于具体的概念,比如一把桌子、一把椅子,这是小概念,哲学研究一般不处理这样具体的问题。”

宽窄作为一个大概念来说,其主要特点就是内涵极其丰富和丰厚,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来概括。崔唯航举例说,“我们找一下新华字典,找一下现代汉语词典,甚至从网上百度一下,查一下什么是宽窄,我想我们一定能查到,但是查到的任何答案我们都不会完全满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它简单下个定义,哪怕给宽窄下一百个定义,也不能穷尽其含义。因为刚才大家从不同侧面已经充分展现了宽窄的重要内涵。”

对于宽窄这样的元概念,崔唯航认为,“它的特点其实是一种生生不息,在不同的境遇下,你对它的解读都会有新的含义。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概念,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非常广阔的阐释空间,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发现它的不同的意义。”

“在此我想借用一下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视角来理解‘宽窄’。”崔唯航说,“学哲学的人都知道,康德发起了哥白尼革命,他从根本上转变了哲学的发展方向。我们经常讲,一种哲学,只有超越了康德,才可能是好的哲学,否则,如果回避康德,绕道而行,那么只能有坏的哲学。”

在哲学层面上讲宽窄哲学,这个宽窄是一个元概念,是一个在哲学上非常高的层面。“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概念的时候,确实需要哲学的高度。”

“关于空间,我想再换一个词。因为我们经常讲的时间空间,其实它是外来词汇,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本土话语。现在我们特别强调中国话语,所以如果用中国话语来说空间的话,可以换一个词。这个词讲空间我觉得讲得更好,而且更有文化,这个词就是方位。”崔唯航说,“我们中国人讲一个事物、一个居所,其方位在哪里,我觉得更好,不一定叫空间。这一点也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从方位的角度来看宽窄,来看宽窄哲学。”

崔唯航本次主题演讲的题目为“宽窄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为何在方位前面加了两个字,叫历史方位?崔唯航坦言,想从历史方面的角度来探讨宽窄和宽窄哲学,看看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几天应该说有特殊的意义,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在哪里?特殊在于恰逢党的十九大召开一周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崔唯航认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重要的、最具重大意义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句话: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只有理解了历史方位,才能够理解我们的新时代。如果从历史方位的角度来看,那么宽窄的意义就更加非同凡响。”崔唯航说,“大家在讲宽窄的时候,不仅是空间,不仅是方位,而且都有历史,这里面我觉得可供挖掘的地方非常多,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历史方位的高度来进一步挖掘宽窄哲学的重大意义。”

此外,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崔唯航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如今,我们讲新时代,讲宽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回顾和反思这40年来中国的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哲学研究中,理论创新还弱一些,原创性的少。”崔唯航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概念供给不足,我们还没有创造出能够充分反映我们时代特色和实践特征的哲学概念。”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思,不局限于这40年。”参加本次论坛,崔唯航透露,自己带了一本书,是成都著名学者贺麟先生写的《50年来的中国哲学》。为什么说是50年?崔唯航分析说,因为这是贺麟于上世纪40年代写的之前50年的中国哲学,也就是说至今一百多年来我们都面临着西学东渐的问题。这本书的第一段就讲西学东渐的过程,西方的思想文化蜂拥而进。其实,贺麟发现的问题也是这样,西学东渐影响非常大,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汉语哲学还比较薄弱。“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提出标识性概念的任务极其繁重,这也是我们中国学者的一个使命和担当。”

在这一点上,宽窄哲学也隐含着这方面的意义,“不仅仅是要构建一个宽窄哲学的概念系统,更多的是要有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使命和担当。”崔唯航表示,在这方面,贺麟先生做了非常好的表率,推进汉语哲学。“我们需要沿着贺先生开创的道路构建我们的标识性的概念。标识性概念,核心还是要回到宽窄,宽窄有很大的发展共性。我觉得如果我们阐释得好,能真正进入我们的学术文化思想领域、哲学领域,将大有可为。”

巴蜀智慧博大精深,对于宽窄哲学的意义,崔唯航认为,“它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厚,给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工作留出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有这么多人支持和推动,我个人觉得非常有信心,宽窄哲学在未来汉语哲学的建构中,一定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